

在朝廷与西藏之间:八思巴的双重角色与两套话语^①

张 云

[摘要] 文章探讨了作为元朝国师和萨迦派领袖、担负政教双重职责的八思巴在朝廷与在西藏地方不同的身份和话语体系,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转换问题,同时分析了成功实现这种转换的条件,借此展示元朝上层人士政教生活的一角,以及解决入世与出世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希望八思巴的事例也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八思巴;朝廷;西藏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4)04-0041-09

八思巴是元朝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并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人物,他具有双重身份:在朝廷是代表西藏地方利益,并反映西藏地方政教诉求的关键人物,担负着下情上达的责任;在西藏他则扮演着国师(或帝师)和朝廷高级官员的角色,担负着上令下达的使命。双重角色要求他使用两套话语,并不断在其中进行角色转换。这对于一个政教地位崇高的高僧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要不断转换目标与采取相应的手段,这一切时刻都在考验着他的才识与智慧,最突出的是考验着他如何协调宗教与政治两者的关系。八思巴的成功应对,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东西。

一、八思巴在西藏的身份和话语

在蒙古王子阔端坐镇凉州经营西藏地方之初,发给萨迦派首领萨班智达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函中,就已明确萨班政教首领的定位,“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故此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②从这里可以看出,阔端要求萨班配合实现西藏地方对大蒙古国的归附,并担任自己佛教事务方面的顾问或上师,并在西藏地方归附后担任西藏地方的佛教领袖,管理各派事务。后来八思巴继承了伯父萨班的衣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课题《西藏历代边事边政与边吏研究》(编号XZ1225)的部分成果。

^②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M],藏文本第118—119页;陈庆英、周润年、高禾福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81页。

钵,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1253年(藏历阴水牛年)新年时,忽必烈请求传授灌顶,赐给八思巴刻有“萨”(sa)字、镶嵌有珍宝的羊脂玉印章。同时忽必烈还赐给八思巴黄金、珍珠镶嵌的袈裟、法衣、大氅、僧帽、靴子、坐垫、金座、伞盖、全套碗盏杯盘、骆驼和乘骡及全套金鞍鞴、法螺等作为供养。^①

1254年即藏历第四饶迥木虎年,薛禅汗赐给萨迦派一份被称为《褒护僧人的诏书》,内称:“朕与察必可敦(蒙古语对皇后、王妃的称呼)对其功德、事业及教法生起信仰,先前已任教法及僧伽之主。现今复从法主萨迦巴、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仰,皈依佛法。于阴水牛年接受灌顶,听受众多教法。尤其为担任教法及僧伽之主,看视上师八思巴之情面,故以此护持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奉献于佛法。此外,已赐给上师(八思巴)黄金及珍珠镶嵌之袈裟、诸抱装饰之佛塔、法衣、僧帽、靴子、坐垫等,器具有黄金伞盖、金杵、银爵、珍宝镶嵌刀柄之腰刀,还有黄金一大锭、白银四大锭,乘驼、骡子、全套黄金鞍鞴。复于虎年为法缘赐白银56大锭、茶200包、锦缎110匹。总之,诏书及器物俱已作为对教法之供养而奉献。汝藏地之众僧当知此情,不然如何遵奉圣旨。汝僧人们不可争官位,官多了反而不好,亦不可因有圣旨欺凌他人。汝僧人们不从军、不参战,依着释迦牟尼之法规,知其经典者讲解,不知者听受,专心向法、诵经、修持,祷告上天,为朕祈福。或有人谓:不必学经,修持即可。不学何谈修持,懂得教法方可修持也。诸老僧当用言语教青年僧人学法,青年僧人当听老僧之言语。汝僧人们已免兵差、赋税和劳役,岂有不知此乃上师及三宝之恩德者乎?若汝等不照释迦牟尼之法规行事,则蒙古诸人必曰:释迦牟尼教法果可行否?岂不问罪于汝等耶?汝等不可以为蒙古人于此一概不知,偶或一次两次不知,久后必知之。汝僧人不可行恶行,不可使朕在众人面前丢脸。汝等应依教法而行,为朕告天祝祷,汝等之施主由朕任之。此乃皇帝之真实诏书,阳木虎年(1254)仲夏月(五月)九日于汉藏交界之地的上都写就。”^②忽必烈颁布给僧人的诏书为处理好西藏地方的政教关系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获得特权和经济保障的僧人要遵守释迦牟尼教法,不要做坏事。由于僧众是当时吐蕃地方社会最大的一个群体,僧众安则社会稳。僧众又是对百姓精神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让僧众持戒守法自然是抓住了稳定吐蕃地方的关键环节,也为八思巴在西藏地方处理好政教关系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八思巴不仅拥有了教主的身份,而且还兼管吐蕃地方行政事务。元世祖忽必烈“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③其在西藏地方地位之高由此可见。

八思巴在西藏地方的身份既是由阔端和萨班凉州会谈中约定的,也是由八思巴在元朝西藏地方事务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授予的。只有这样才能在西藏地方发挥影响力并切实履行职责。与此同时,精通吐蕃事务的八思巴也代表地方对忽必烈的吐蕃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既包括积极推动作用,也包括修正乃至劝阻作用。

在西藏地方,八思巴既是一位萨迦派领袖,更是一位了解皇帝旨意和王朝精神的高级官员。有权有势,可以传达皇帝的旨意与相关信息,也可以循循善诱化导众生,说明朝廷的有关方针,落实忽必烈赋予的稳定地方的职能。八思巴在给法主扎巴僧格的信函中就说道:“现今皇帝安居于索申(མེ་ཤུ་མེ་ཤུ་ so zin)地方,汗王以当前事项铭记于心,下诏对僧人、方士等敬奉上天之人一概免除兵差,使其安居乐业,并命萨迦派管领所有执事及僧众。为赉送此诏书、清查人口及迎请上师,已派遣周(《萨迦五祖全集》记为:格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9—160页,汉译本第111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6页,汉译本第116页。

③ 《元史》[Z]卷202,列传第八十九释老。

西多吉周和格西松布)前来。”^①这里涉及到皇帝的行止,元朝免除僧道兵役的措施,颁布诏书,在西藏地方实施清查户口等诸多大政方针,以及派人迎请上师等,可以被理解为重大信息的权威发布。

在邀请聂塘巴·扎巴僧格(ཉེ་ཐང་པ་གྲགས་པ་སེང་གེ snye thang pa grags pa seng ge)前来为其授比丘戒时,八思巴提到:“现今国家安定,行路容易,朵康一带俱是我们的弟子,此点请你牢记在心。为此事,我已派遣岗曲巴前去,他将尽力服侍你。随信所附礼品及你前来之费用由国王府提供白银五十三大锭。所献不多,待你来此之后我们众人在教法及享用方面不须发愁,定会丰足如意。阳水鼠年(1252年)二月三日写于凉州王宫之佛殿。”^②八思巴强调指出了蒙古统一管理之下大局稳定、藏区安定的情况,以及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在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当然也有八思巴受到崇高礼遇与丰厚供养。虽然有劝慰扎巴僧格的意思,却也传达出国泰民安、王室重教的政治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通过西藏地方高僧发挥安定民心作用的用意。

设立十三官既有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用意,同时也具备衙署和职官的性质。关于八思巴所设置的13种侍从官员,《贤者口饰》一书记载:“附带述及内外官职之名称为,索(གསལ་ gsol)、森(ཀའི་མཁུ་ gzims)、却(མཚོ་ mchod)三者;可宾(མཛེལ་ mjal)、仲译(ལྷ་ཡིག་)、司库(མཛེལ་ mdzod)三者;司厨(ཐག་ thab)、引见(འཕྲོ་ vdren)、营帐(གྲྭ་ gdan)三者;管鞍具(ཐུ་ skya)、管马匹(རྟ་ rta)、管牛(མཛེལ་ mdzo)、管狗(ཐི་ khyi)四者。此是伟人应有的十三种侍从官员,这十三种官员是从萨迦派法王八思巴时开始设置的。”他将侍从官员分为3个1组的3组,2个1组的2组。3个1组的3组即索本、森本和却本3个1组;司宾、仲译和司库3个1组;司厨、引见和营帐3个1组。2个1组的2组即管鞍具和管马匹的1组;管牛和管狗的1组。当时存在多种不同说法,作者自称采用了可靠的史料。^③

高僧入世与出世观念的辩论。《萨迦世系史》记载了八思巴与迥丹热智的一段对话,实际上涉及到作为藏传佛教的高僧,究竟应该采取入世的态度还是出世的态度的一场争论,“八思巴三十三岁的阴火兔年(1267)时,大皇帝派遣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八思巴前往朝廷。当时,八思巴设置了十三种侍从官员,随即启程。迥丹热智寄诗嘲讽说: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剥夺,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者就不成为圣者。”

迥丹热智的指责主要有三点:一是高僧的拉章变成了衙署,高僧变成了官员;二是八思巴等不再关注众生的幸福与否,业已脱离信众;三是八思巴不再坚守苦修,而是贪图官爵富贵的世俗之乐。诗句之末,还借用“八思巴”(འཕགས་པ་ vphags pa,意思是“圣者”)之名,讥讽连上述三者都不懂,还自名“圣者”?言下之意,八思巴没资格做圣者。应该说,迥丹热智直指要害,而且言辞十分尖刻。

然而,八思巴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萨迦派领袖,他的回答同样精彩和充满智慧。史书记载:“法王八思巴对此作诗回答说:教法兴衰为佛陀所言,众生之幸福由业缘而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④

八思巴的回应紧扣质疑:首先,佛陀讲过了,佛法有兴有衰,非人力所能决定;其次,众生的幸福取决于前世的修行和业力;第三,传播佛法、教化众生要因势利导。八思巴的回答将人格行事的是非之争变成一种藏传佛教内部不同处世观的理论之争。诗句的最后,八思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迥丹热智(འཕགས་པ་རལ་གྲི་ bcom ldan ral gri,意思是“贤者”)“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毫无疑问,八思巴的回应反映了他机智、聪明,才思敏捷,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当时不同教派,乃至不同高僧之间不同的修行方式,以及在处理入世和出世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后来通过曲弥法会,迥丹热智转而佩服八思巴的卓越才能和智慧,还写下了《赞颂诗——梵音雷声》,奉献给法王八思巴。^⑤这说明八思巴的入世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1—172页,汉译本第121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4—175页,汉译本第123页。

④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4页,汉译本第123页。

⑤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9页,汉译本第150页。

观得到了迥丹热智的认同。

当法王八思巴由朝廷回来住在伍由地方时,当地摊派差役,襄拉普瓦的一个侍从前来送信,见八思巴的帐幕边有杀生的蒙古人围护,八思巴坐在一个彩纹坐垫上,右边是写文书的抄写人,左边是写书信的记录人,前面陈列着抛施食子,八思巴正一边念抛施食子之咒语,一边抛食子。^①侍从心中有怀疑,被八思巴看穿。他获得感悟,“我知道八思巴的行为是随类教化,蒙古人杀人、摊派乌拉、赋税那是各人自己之业缘。”^②这是八思巴在与迥丹热智交锋之后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难题,即八思巴为何与那些被贴上杀人标签,还向西藏地方百姓摊派差役、征收赋税的蒙古人为伍。八思巴应对的方法是两方面的,一则念咒抛洒食子,以驱除施加者的罪孽。一则用佛教因果的理念加以解释,那是蒙古人自己的业缘。虽然谈不上特别高明,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侍从心中的部分疑惑。

八思巴还把内地刊印的佛教经典带给西藏地方的高僧大德。南喀本在自己的书中称,我为我的上师袞却僧格带来的信函还没有得到八思巴的回复感到有些失望时,八思巴随即回复这封信,并说:“这些你保管好,他喜欢的全套经典,在汉地很容易得到,以后从汉地给他捎来。”^③

把内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介绍给西藏的僧众,也是八思巴有所用心的一个方面。“十九日夜间,八思巴召集随同去汉地的格西及众官员,发放供养,并讲汉地的行走方式、格西们举行法事的仪轨等诸多教诫和教规。”^④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八思巴十分重视介绍内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汉传佛教的一些宗教特点,这有助于前往内地的西藏高僧大德与地方官员了解中原文化,在增长西藏僧俗官员相关知识的同时,也发挥了两地之间文化沟通者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阴火牛年(1277)春正月,由汗王真金担任施主,在后藏曲弥仁莫举行大法会,法王八思巴向7万多僧人供献丰盛的饭食,为每名僧人发放黄金一钱,每3名僧人发一套袈裟,并广为宣讲佛法。参加法会的有僧人7万,可以讲论经典的格西数千,加上一般民众,总数达10万人之多。^⑤

八思巴与噶当等派的密切交流,既切磋了佛法,也联络了感情,扩大了在西藏各教派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当八思巴33岁的兔年前往蒙古地方的路上,与噶当派61岁的僧人南喀本会见,互相问难说法,八思巴因而得到噶当派许多人的信仰。^⑥南喀本在八思巴到达达木(འདམ་vdam,当雄)时写信请八思巴的侍从坚色转交,鉴于八思巴白天来人多不得空闲,希望次日晚上会晤,见到信函后,八思巴说:“其他人来都是随便而来,专门为教法而来的只有他一人。”主动让坚色“明天早上将大乘明论及经论要集两部书送给他”。^⑦

南喀本在书中说:“八思巴向我反复询问噶当派的阿底峡师徒(ཇོ་བོ་ཡབ་སྐུ་ jo bo yab sras)、瑜伽师三兄弟、朗塘巴(གླང་ཐང་པ་ glang thang pa)、夏尔瓦(ཤར་བ་ shar ba)、乃素瓦(སེ་ཟུ་བ་ sne zur ba)、甲域哇(འཇམ་དུ་བ་ bya yul ba)、堆龙巴(ཐོད་ལུང་པ་ stod lung pa)等噶当派各位先师的法行、事迹、功德、享寿多少、名号及家族,有多少弟子等情况,”并将这些先师的名字大多记录下来。^⑧同时,八思巴还应邀对达龙巴(སྟག་ལུང་པ་ stag lung pa)的官员灌顶讲法,还给曲弥巴(ཆུ་མིག་པ་ chu mig pa)讲《俱舍论》等。^⑨八思巴对噶当派祖师、教法和高僧的尊重,赢得了整个教派对八思巴的尊重,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的威望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20—221页,汉译本第151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20—221页,汉译本第151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9—180页,汉译本第126页。

④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0页,汉译本第126—127页。

⑤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5页,汉译本第148页。

⑥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5页,汉译本第123页。

⑦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6—177页,汉译本第124—125页。

⑧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8页,汉译本第125—126页。

⑨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171页,汉译本第119—121页。

二、八思巴在朝廷的身份和话语

在朝廷中的八思巴是国师或者帝师,也是忽必烈皇帝西藏事务的高级顾问,他的身份代表着西藏地方的利益,担负着下情上达的使命。从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八思巴通过自己渊博的西藏历史知识向忽必烈展现西藏并非蛮荒之地,而是人才辈出、历史辉煌的一方土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忽必烈似乎也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汗王,他从认识八思巴的那一刻起就很注意与八思巴探讨吐蕃地方历史上的人和事,一方面有学习请教的意味,另一方面也似乎在甄别、考察鉴别八思巴的见识与学问。史料记载,牛年(1253)中,因薛禅汗忽必烈的邀请,八思巴前往宫中。汗王向他咨询过许多别人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均一一答复。汗王又问:“你们吐蕃地方曾出过哪些伟人?”八思巴回答:“我们吐蕃地方的伟人有法王祖孙三人。”又问:“他们三人为何是伟人?”答:“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之化身,赤热巴金是金刚手菩萨之化身,所以是伟人。”又问:“你们吐蕃地方所出勇男子为何人?”答:“我们吐蕃地方的勇男子有名叫米拉日巴者。”又问:“他是什么样的人?”答:“前半生摧毁仇敌,后半生修佛法获得成就。”又问:“你们吐蕃地方学识功德何人为胜?”答:“学识功德以我的上师法主萨迦巴等人为胜。”^①从这里的对答中,读者可以注意到忽必烈关注吐蕃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同时也注意掌握当时吐蕃地方最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人物的情况。八思巴则从佛教的立场评价了包括吐蕃时代的三位赞普和大成就者米拉日巴的卓越业绩,又当仁不让地提到自己的伯父萨迦班智达的学识功德。两人的问答简洁明了却又包涵丰富内涵,颇见学识和功力。让人叹奇的是,谁能想象这回答汗王各种疑难问题者竟然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

在忽必烈称汗之后,作为其西藏问题顾问的八思巴为元朝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实施有效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既作为僧人,也为百姓考虑,八思巴曾经对忽必烈在西藏地方派兵差、征收赋税的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史书记载:后来汗王(忽必烈)下令,派人前往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仁波切再三向汗王陈述:“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汗王不予接受。八思巴因这一请求未得允准,心中不悦,向汗王奏请:“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汗王说:“那么,可以前去。”察必皇后从中说和,他们君臣二人继续讨论。^②由此看来,他为了西藏地方免除兵役差税竟然与皇帝翻脸,足见其坚持、勇气和决心。

忽必烈也很好奇八思巴哪里来的这么倔强的性格或底气,他进一步直截了当地问八思巴:“你为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对此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的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汗王说:“吐蕃地方何时有王,何人遵奉拥戴?这与佛书所说,必是虚妄。”八思巴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收服南瞻部洲三分之二,此后汉地与吐蕃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并说,此事实有,佛书虽不载,但有文书记载,请查阅即可。”翻阅汉地先前之史籍,见上面的记载正与八思巴所言相符,汗王心喜。此后,八思巴又说:“我的祖父之时,西夏王曾献一可将公鹿从角尖整个罩住的锦缎伞盖。”汗王派人到萨迦去察看,回报真有此物,汗王父子俱生信仰。^③这一系列的对话体现了忽必烈要刨根问底,而且要通过反复地求得确证才善罢甘休的性格,而八思巴则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史实:一是自己的祖先曾经被汉地、西夏、门地,以及印度的帝王奉为上师,所谓家学渊源深厚,身份显赫;一是自己来自的吐蕃地方曾经有过一段卓著的文治武功,既有迎请唐朝公主和释迦牟尼佛像的佛门盛事,也有过吐蕃兵临长安的惊世武功;一是西夏王还曾经向自己祖父(应是扎巴坚赞,^④གཙུག་ལ་བླ་མ་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76)奉献了一顶锦缎伞盖。

当察必皇后劝忽必烈接受灌顶,并获得同意之时,问题又出现了。八思巴说:“恐怕汗王不能遵守法誓,眼下又没有好的译师,还是等将来吧。”汗王问:“要守什么样的法誓?”八思巴说:“受灌顶之后,上师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2—153页,汉译本第106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1—152页,汉译本第106—107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2—153页,汉译本第107页。

④ 传记资料显示,扎巴坚赞后来“又往北方金色神界,以摄轮王身份遨游整个佛国。”

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汗王说:“此事不可。”王妃调解说:“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压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①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八思巴和忽必烈都属于性格倔强的一类人物,问题是忽必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八思巴应该知道他犯言直谏可能会引发的后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有的退让。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忽必烈皇帝有足够宽阔的心胸容纳八思巴的犯言直谏。

虽然表面上存在激烈争执,但忽必烈内心里对八思巴有着很高的评价。他曾对前往吐蕃负责设立驿站的大臣答失蛮说道:“上师八思巴伯侄,本是一方之主,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已在我朝管辖之下。”^②这个时间大约在1264年,即在上述争执之后,说明忽必烈对八思巴学识的高度认可。至于作为忽必烈全国佛教和吐蕃地方事务顾问的八思巴,在政治、军事、用人,乃至经济方面的出色才能,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也有记载,学者们也有所关注。

从史料记载来看,作为国师的八思巴,他在朝廷的宗教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也获得大批的供养。《元史》有大量记载,藏文史书也记载了相关史实,诸如“他先后领颂《甘珠尔》经,因而得到黄金二千一百五十七两以及无数财物,薛禅皇帝(忽必烈)也两次赉送千锭大银。”“所获的供养物品难以计数。”^③看起来,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仗义执言使为西藏地方争利而受到影响。

从有限的资料所获信息来看,八思巴既在西藏地方扮演了尽职朝廷、服务王朝统一的角色,同时又与西藏地方的各界人士交流中显示了极有耐心、循循善诱的智者形象。而在朝廷方面,他则尽力履行西藏行政宗教事务顾问的角色,让藏传佛教在王朝和王室的各类公私重大活动中表现得有声有色,同时八思巴又在与忽必烈的对话中展现出为了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利益而刚直不阿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三、八思巴的见识学识、处事原则与身份转换

八思巴在复杂政治局势下,依靠自己的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超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在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都很好履行了职责,经受了各种考验、顶住了多种压力,并顺利实现了两种职能不同、话语差异的两个角色之间的自由转换,其成功之处应有多种因素促成。忽必烈的贤明无疑是重要因素,而八思巴自身的禀赋和修炼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卓越的识见 八思巴自幼展现出良好的天赋,有一流顶尖级学者、伯父萨迦班智达的悉心培养,加上个人的勤勉努力,得天独厚的求学交往条件,以及难得的历史际遇的磨砺和锤炼,让八思巴不仅拥有超越同时代、乃至前人的不凡见识。1253年,八思巴接受邀请从阔端的儿子蒙哥都那里转归忽必烈,在六盘山地区成功实现了第一次英明选择,那时他才只有18岁;他与拒绝忽必烈邀请,投奔蒙哥汗的噶玛拔希斗法获胜,与噶当派高僧辩论入世与出世问题,赢得对手认可,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佛学素养和出色辩才,同时更体现出他不凡的见识。当忽必烈面对各派挑战,提出只许信奉萨迦派而禁止其他教派传播时,作为萨迦派首领的八思巴却婉拒皇帝的美意,建议各教派一仍其故,百花齐放,同样展示出他宽阔的胸襟和长远的见地。

(二)渊博的历史知识与高深的佛学造诣 八思巴给忽必烈介绍吐蕃时代先辈的辉煌历史,展现其丰富的历史知识;1257年,八思巴接受忽必烈的任命,主持僧道两家在上都(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进行辩论并取得胜利,除了展现其渊博的宗教知识之外,还体现出出色的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八思巴参加不同文字版本佛经的对勘,合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撰著大批佛学著作;他还根据忽必烈皇帝的要求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并因此被晋升为帝师;1277年,由忽必烈皇太子真金代表父亲做施主,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日喀则纳塘寺附近),举行了有7万僧众参加的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等等,都体现出八思巴在历史和佛学等领域渊博的知识。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4页,汉译本第108页。

②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9页,汉译本第150页。

佛教功德卓著,物质上律己甚严。史书称,八思巴除了显现无数奇异神幻之外,还在朵甘思书写金汁佛经115部;在达托细莫切书写金汁佛经40部。此外,在萨迦大殿建立班智达黄金果芒塔,并为此塔所在的佛殿修建了大金顶。总之,他将逐日得到的财富全部用来供奉三宝,以及为贫苦者发放布施,从来没有把芝麻粒那样大的一点用在自己身上,故他得到富足圆满之果。^④八思巴的广施与无私在这里被很简练但也很准确地刻画出来,他是一个倾心佛教事业、律己很严的尊者。

④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9页，汉译本第150页。

善于沟通,协调各方关系,与各教派保持广泛的宗教联系。八思巴的侍从官员对《记法王八思巴的一些奇异事迹之传记》作者、噶当派的南喀本说:“上师要赐给你一份法旨,本应给书写法旨的人每人一个淆(相当于一钱)的黄金,因你是个修行的僧人,故我们就不要了,请你记在心里。请今夜过来。”^①南喀本记载道:“我们去时,已是深夜时分,此时在一座能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毡帐篷中,八思巴向噶当等派的僧人讲了大小乘共同之法,以及各派别之教法,特别讲了佛法之精要密咒。论述六波罗蜜多之密咒法、六波罗蜜多、三部因明、二谛和二次第等等,又讲浊世期颂咒之理,以及印度大成就者依靠咒语获得成就之理,并广说咒语念诵之一坐法。”^②从这里可以看到八思巴使用抄经者和抄写法旨的人一般都好付给报酬,对于个别有修行的僧人则例外。同时,他讲经涉及大小乘、各教派,而没有局限于某一派,很自然地赢得了尊重和理解。

做好细节,有人情味,善于笼络人心。八思巴先后4次赠给作者南喀本的礼物,包括八思巴的法衣、一件新的法衣、一匹缎子、一个淆的黄金和一匹马。^③南喀本还记载道:“他(八思巴)随从叫朗钦开饭,让我坐在他跟前吃。上师让侍从给我送的饭食比他自己的多三分之一。给帐房中其余十来个人每人一份饭和一块肉。”^④甚至晚上休息,八思巴让南喀本和他睡在一个铺上。^⑤可以说,人情味很浓厚,关爱用心,体贴入微,让作者感动得留下热泪,自然会赢得其他教派的尊重与归心。

(四)突出的个性特征 有自己的强烈渴望和无比的个人自信。八思巴邀请聂塘巴·扎巴僧格为自己授比丘戒是他的一件大事,在给扎巴僧格的信中,使用了一切手法和语言,包括对上师的崇高礼敬(“为众生所悦服之伟人、天界人世之导师”)、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高度重视和嘱托(临终前的告诫“你未受比丘戒,使我不安,其余并无挂念”)、扎巴僧格是不可替代(萨班说:“当今,卫、藏、康三地未有如上师扎巴僧格博通而尊胜之人,他可与辛底巴相比”)、悲情(“多方邀请你仍未前来,不知何因,颇使我失望。”“如你不来,我又无其他合适之堪布,恐今生不能受比丘戒。也不能听受许多教法”),乃至涉及到噶当派和双方关系的发展(你如若至我处,其一是你对萨迦派的看重,其二是为我授比丘戒而来,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最根本情分亦会因此而建立),最后是国家大局安定、交通便利、沿途有人照应、经济上有保障。^⑥

可以看出八思巴对此事的极度重视,也可以看出他对扎巴僧格前来十分渴望,以及万一扎巴僧格不能来后果的焦虑,表现出一般人应有的人情,乃至人性弱点。

法王八思巴于41岁的鼠年(1276)回到了萨迦大寺。此时,乌思藏各地许多掌管教法的格西以及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前来聚会。此外,因八思巴之声名传播到印度和迦什弥罗等地,故有许多班智达从那里前来。八思巴说:“现在吐蕃地方所有的各种显密经论咒语我都具有,你们各人想要的教法皆可来请教。”^⑦史书中记载了八思巴谦虚好学的一面,这里我们看到了拥有渊博学识的八思巴的无比自信的一面。

史书记载,八思巴除了在佛经刻印、佛殿修建、散财供养等方面多有业绩之外,他还广收弟子、传法授戒,为佛教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展等方面作了卓越的努力。他先后担任过比丘和比丘尼、沙弥和沙弥尼1425人的受戒堪布。他的亲传弟子们又为人授戒,例如其弟子却吉衮布(ཆོས་ཀྱི་མགྲོན་པོ་ chos kyi mgon po)在一年中就为100名比丘和947名沙弥担任受戒堪布。再由弟子们剃度出家的弟子更是数量众多,遍布各方。^⑧从而为萨迦派、为藏传佛教的弘扬发挥巨大作用。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2页,汉译本第128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2页,汉译本第128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2—184页,汉译本第128—129页。

④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4页,汉译本第129页。

⑤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4页,汉译本第129页。

⑥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171页,汉译本第119—121页。

⑦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4页,汉译本第148页。

⑧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9页,汉译本第150页。

正是时代给八思巴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才华的舞台,而八思巴个人良好的禀赋,以及后天的勤恳努力成就了他的伟业,使他不仅在元朝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在朝廷和在地方的各种复杂问题,并成功实现身份的顺利转换。

八思巴为什么离开大都、离开忽必烈而卜居临洮?《萨迦世系史》的说法是,八思巴要求速返吐蕃,皇帝和大臣虽然要求八思巴速返,但又依依不舍。“从八思巴开始准备动身起,大皇帝即已预察到八思巴之寿数不很长”,因此不忍分离,亲自为八思巴送行,送行的时间也从一天增加到一个月,又从一个月增加到一年。^①这基本上解释清楚了八思巴离开大都的原因,即八思巴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八思巴圆寂后,没人敢去朝廷传递这一噩耗,只有八思巴的却本,后来做了帝师的扎巴沃色(ཐག་པོ་འཇམ་དཔལ་གྱི་པ་ grags pa vod zer)前往朝廷汇报。“当忽必烈皇帝知道八思巴去世的消息后,遂把八思巴的尸骨放在头上多次祝祷,所有的尸骨变为舍利子,皇帝拣起象牙说:‘这不是我上师的尸骨。’遂扔到一边。据说其后将八思巴的一部分尸骨赐给了吐蕃。”^②再度描述了忽必烈与八思巴君臣之间真挚的感情。

至于八思巴离开大都是否有其他因素呢?范德康教授认为,“后来,八思巴又在临洮度过了四年,远离宫廷,这期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八思巴和忽必烈及其家族成员之间不再坦诚相待,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忽必烈请非萨迦派僧人担任帝师,就是有名的乌坚巴·仁钦贝。”关于作为帝师的八思巴和作为皇帝的忽必烈之间的关系及角色,“藏文文献中对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叙述,传统的标准看法是,八思巴为忽必烈的金刚上师,地位高于忽必烈,因为在佛教密续实践中,金刚上师的地位甚至比佛还要高。但是蒙古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并且如果看一下八思巴本人的作品就知道,1274年,他向忽必烈请求:‘请让我回萨迦去吧!’忽必烈同意之后他才离开,回了萨迦,再也没回来,直至1280年逝世。如果他的地位比忽必烈高或与忽必烈平等,那么就不需要请求后者的同意。”^③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宗教氛围浓厚、影响突出的藏族历史研究来说,学会客观评价宗教人物的历史地位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它也是破解所谓“供施关系”说的一把钥匙。

博多哇(པོ་དོ་བླ་ po to ba)曾说过,只要得到一厘一钱的护佑,骑上骏马,路上有口粮,有知心的伙伴同行,有好的向导,不管要走的路有多远,心里都是高兴的。^④南喀本引述了这段话,八思巴让他重新说了一遍,并让近侍把这段话抄写下来。^⑤阅读八思巴的著作和传记,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留下的业绩,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在我们心中涌起,还会引发对处理佛教与社会关系的诸多思考。

[本文责任编辑 徐绍强]

[作者简介] 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101)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13页,汉译本第147页。

②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231页,汉译本第157—158页。

③ 范德康:《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的几点评论》,2010年6月11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Prof. van der Kuijp)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讲座稿。

④ 《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83页,汉译本第129页。

⑤ 同上。